

姚雪垠
抗战作品选

春暖花开 的时候 (上)

姚雪垠◎著

在动笔写之前，我将小说定名为《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认为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第二次革命高潮。一二·九运动是一声春雷，抗战开始后就进入春暖花开的时候。虽然会有疾风骤雨，但春天的来临毕竟不可阻挡。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长篇小说

春暖花开 的时候 (上)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暖花开的时候 / 姚雪垠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8

(姚雪垠抗战作品选)

ISBN 978-7-5348-5036-3

I. ①春…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2971 号

编 选: 姚海天

项目统筹: 马 达

责任编辑: 刘春龙 王建新

责任校对: 贾 群

出 版 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龙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mm 1/16

印 张: 38.5

字 数: 4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在抗战初期，关于如何表现抗战生活，作家们有各种写法。我是较着眼于抗战期间坚决抗日与阻碍抗日两种力量的斗争，进步力量与顽固力量的斗争，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通过写这种斗争，表现中国人民同时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

——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



作者在鄂北前线时 (1939)



均县“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集体照。左6坐者为姚雪垠。(1939)



《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原版书与港版书。

出版说明

明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我国人民永世铭记的日子，我从父亲留下的180多万字的抗战著作中，编选出“姚雪垠抗战作品选”——《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和《四月交响曲》，奉献给读者。在书即将面世前，关于这些作品的写作背景等情况，我在书前略作说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父亲上了日文报纸“抗日文艺界人士”的黑名单，他即蓄须，先送我母亲出城，然后逃出北平，经冀鲁过海道回到开封，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在河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父亲和嵇文甫、王阑西创办的《风雨》周刊，成为中原地区的抗日宣传基地和救亡组织中心。不久，父亲以《风雨》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奔赴战火纷飞的徐州前线采访，撰写一批反映前方军民英勇抗敌的通讯报道。之后，父亲来到全国政治中心的武汉，写出报告文学《战地书简》和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后者在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茅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在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两年后，父亲创作了同样反映敌后农民游击队员生活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它以朴素鲜活的中原乡土语言，成功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主题思想，而产生广泛影响。

1938年冬，国共合作初期，父亲应钱俊瑞之邀，同胡绳、夏征

农、臧克家、田涛、碧野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赴襄樊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中华文协分会在均县举办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父亲主讲唯物辩证法，深受学员的欢迎；讲习班男女学员的学习、生活和文工队的两女性为父亲一年后写作《春暖花开的时候》提供了素材和原型。之后，父亲参加“笔部队”，多次奔赴鄂北、皖西和豫南的前方和敌后，写出了《蚌埠沦陷后》、《界首集》、《战地春讯》、《血的蒙城》、《四月交响曲》、《随县前方的农民运动》、《鄂北前线的神秘武装》等作品，反映了日军的残暴、百姓的苦难、抗战的艰苦卓绝和军民的英勇战斗。这些作品如号角、如匕首、如枪弹，汇入了时代的最强音。父亲不愧是一名抗敌救国的战士！

1939年秋，在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老河口，父亲开始动笔创作他的长篇处女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敌机对老河口日夜狂轰滥炸的日子里，父亲常在母亲的陪伴下，带点干粮，每天一清早来到郊外，从农家借张小矮桌和把小椅子，在草棚或树荫下，在粗劣的草纸上写作；没有小桌子，就把稿纸铺在椅子上，蹲在或坐在地上写，时间长了，双腿麻木，就站起来活动活动，拍拍身上的灰土。有时候敌机突然飞行投弹，或从头顶贴着树梢呼啸而过，来不及去庄稼地躲避，母亲惊叫“雪垠！雪垠！”趴在父亲身上，父亲镇静地说：“不怕！不怕！”敌机一飞走，接着写下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一边写，一边将稿子寄往重庆，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连载，吸引着广大读者。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时候父亲还附带写作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1943年初，父亲从皖西金寨前往重庆，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研部副部长，完成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计划3部中的第1部。现代出版社分3册在重庆首印1万，很快脱销，又接连加印3次，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抗战胜利后该社迁回上海又印4次。

《春暖花开的时候》反映了抗战初期河南大别山下某县城的一群青年男女的抗日斗争生活。因为小说紧扣时代，贴近生活，语言朴素流畅，且成功地塑造了喻为“太阳、月亮、星星”的“三女性”，而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浓厚兴趣。小说得到茅盾和胡绳的肯定，但也受到某些人的攻击，被扣上“色情文学”、“娼妓文学”、“市侩文学”的大帽子。解放后，《春暖花开的时候》在大陆绝版，在香港却有3个版本不断翻印，流行于香港和东南亚华人读者中。“文革”一结束，评论界推翻了“色情”等不实之词，给予《春暖花开的时候》平反，研究抗战文学史的学者评价：它是抗战初期第一部真正反映国共合作时期救亡团体内外矛盾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团体中的领导地位的杰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诽谤中停笔，使后两部流产，又为它背上半辈子的黑锅，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1986—1987年，父亲放下《李自成》第四、五卷的紧张写作，花了数月时间，对原书先后两次修订，补写了十几万字，尽力补救因书没写完及国民党的书报检查等原因而留下的种种遗憾。父亲原拟在自编的文集中将《春暖花开的时候》列为第1集，但文集在他生前未能编成。在父亲去世后的2000年及2011年，该书作为第11卷先后收入中青版《姚雪垠书系》和人文版《姚雪垠文集》。这次《春暖花开的时候》出版，是在大陆绝70余年后首次和读者见面。

《牛全德与红萝卜》是中短篇小说集。全书收入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重逢》、《母爱》和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白龙港》、《伴侣》、《人性的恢复》，都取材于抗战，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抗战中各式人物的故事和命运，而使时代的画面更广阔真实和色彩斑斓。

《四月交响曲》是散文集。收入散文、通讯、报告、回忆、杂文、时评等38篇，是父亲在八年抗战中六年置身于正面战场，深入前线

和敌后生活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更及时、直接、真切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和社会百态；并以多篇政论时评，论证欧亚战场的局势和走向，坚信中国不会败。虽然抗战岁月已逝久远，但是今天重读这些作品，当年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和民族的苦难仍历历在目，如亲临其境，令人感慨！

这里还应说明，有几篇文章虽是在抗战胜利后甚至 50 年代写作发表的，但反映的是抗战期间的事情，比较重要，所以也一并收入书中。

为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本书对当年习用的助词和标点符号的用法以及某些特殊用语等，极少改动，主要修订了文字上的错漏之处。

明年 10 月是父亲诞辰 105 周年，适逢中国抗战胜利 70 周年，出版父亲的抗战遗作，也是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暑末，中州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刘春龙先生获悉本书出版计划后，他和张存威社长高度重视，决定尽快出版，他们的眼光、热忱、魄力和王建新主任严谨的编辑作风，使我敬佩和衷心的感谢。

姚海天

2014 年初冬

—春暖花开的时候—

上册

内容提要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后，在河南境内大别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里，一群青年男女投身抗战，办起了救亡工作讲习班。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各不相同，不论担任教师还是学员，大家都怀着同样兴奋的心情，办壁报，搞演出，下乡宣传抗日。他们之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或是党的外围组织的骨干，救亡活动实际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其时不论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压制和打击，还是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阻碍，都不能扑灭大家的热情，扼杀蓬勃生机的救亡活动，教师和学员在错综复杂的抗日斗争中锻炼得更成熟，更坚强。而在这小县城发生的一切，正是当时国内形势的某种缩影。小说以真实的生活，生动的细节，细腻的心理描写，朴素流畅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如“太阳、月亮、星星”的“三女性”的学员黄梅、林梦云、罗兰，有青年教师罗明，画家杨琦，诗人陶春冰，回乡养病的地下党员吴寄萍，战教团团长郭中允、副团长余新之，地下县委负责人郭心清等等，通过他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甚至刚刚萌生的爱情，展现了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男女的救亡生活，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前言

一 为什么将这部小说作为 《姚雪垠文集》的第一卷？

《春暖花开的时候》（以下简称《春暖》）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尽管不免流露出种种幼稚毛病，却不仅是我青年时期的一部代表作，而且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初期内地救亡青年的斗争生活。我关于长篇小说的部分美学思想也由此开始萌发，若干年后发展成我自己的、比较全面的、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长篇小说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表现在《李自成》中。

我是从写短篇小说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在动手写《春暖》之前已经写出了像《差半车麦秸》那样的小说。但我这一生，兴趣最高、用力最大的是中、长篇小说。倘若解放后没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没有那些很不适当的、硬性的组织干涉，能够按照每个作家的实际情况，让他们在总的继承革命文学传统的方向下有一定的创作自由，能够发挥自己才能，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那么我在四十岁以后悠悠数十年的贡献决不仅仅是一部《李自成》。由于我一生用力最勤是中、长篇小说，尤其在长篇小说的艺术问题上思考最多，所以在编辑我的文集时将《春暖》作为第一卷，《长夜》作为第二卷，以下是其它中篇，

然后才是短篇小说……而不是按写作的时间先后分卷。

自从一九八一年《长夜》重印了一版之后，研究《李自成》的同志们很注意《长夜》与《李自成》的关系。其实应该说，我的有些关于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滥觞于《春暖》，发展于《长夜》，成熟于《李自成》。

二 谈一些历史情况

(一)

《春暖》这部小说，开始写作于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一边写一边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上连载。后来由于几种原因，写作不得不停顿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到了重庆，赶着将《春暖》补写完第一部，于一九四四年分为上、中、下三册出书。当《春暖》在国统区“大后方”的刊物上连载时候，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做“强烈反响”。一九四四年以三个分册的形式在重庆出书时候，成为相当轰动的畅销书。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新文学作品的印数通常是两千册，有许多出过一版后就不再印了。倘若能陆续发行一万册，就算是畅销书。当《春暖》在重庆出版时候，被称做抗日“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盘已经大大缩小，较大的城市只剩下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从重庆到各地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春暖》第一次印刷是一万册，而且不到两星期销售一空，不得不赶快重印。不管我当时的思想和文笔多幼稚，但是《春暖》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产生了“轰动”，这是实际情况。从《春暖》第一部出版之后，这部小说竟成了各地读者的热烈话题，

尤其竞相谈论书中所写的“三女性”、“三典型”，或所谓“太阳、月亮、星星”。这也是《春暖》出版后确实发生的历史现象。

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出版到一九四六年，《春暖》共印了四次，以后就绝版了。

(二)

《春暖》刚出版一年以后，在胡风主编的文艺刊物《希望》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批判文章，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学，许多尖锐的语言惊俗动众，不必转引。在我们几十年的新文艺运动史上，有一种习见的规律，表现为以下三种互相联系的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某些批判文章如果代表“左”的思潮，必然背离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文风，而任意发挥某种“主观战斗精神”。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最早出现“左”的思潮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经过三十和四十年代，并未断绝，在不同流派和不同人物的身上作了不同的表现。解放以后，“左”的思潮长期起支配作用，历次运动的所谓大批判，都是发挥各自的“主观战斗精神”，对矛头所指的对象罗织罪款，无限上纲，完全丢掉了实事求是的起码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极左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极点，给国家民族造成极大损失，至今犹令我们为之痛心。

第二种现象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发生在文艺战线上的极左批判，不管打什么旗号，从来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从来都不是为革命利益服务，而是为某些人结成的小圈子服务，常带有浓厚的宗派色彩。

第三种现象是，由于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在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活动中，调子愈左愈能迷惑群众，愈会有人跟着起哄。即以

当年对《春暖》的批判为例，连有些读过《春暖》的朋友们在已经形成起哄势头的情况下，也不敢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轻则对我惋惜，其甚者跟着起哄的势头说话。古人所说的“三人成虎”，就是这个道理。

《春暖》所受的诬蔑性“批判”，影响到解放以后，使我背了将近四十年的黑锅。在历次运动中，同志们在提到《春暖》时总说它是“色情文学”，好像已成定论。因为有一种时代风气作祟，不属于政治性的历史问题，我不能要求组织对此事进行调查，只好多年忍受着“舆论”压力。

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极左思潮的根子依然存在，但是党中央重新提出来实事求是的精神，愿意明辨是非的人愈来愈多了。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判为“大毒草”的作品，纷纷地得到平反。这一股强劲的实事求是之风，也刮到了现代文学史的领域。虽然《春暖》早已绝版，一般读者无法读到，但是少数人为着研究和教学需要，利用私人藏书和图书馆，找到《春暖》原书，进行仔细阅读和分析。于是他们明白了四十年代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学”，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话。我最早看见的文章是发表在《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的《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作者明确地指出《春暖》不但不是“色情文学”，而且连“挑逗”性质的字句也没有。同时或稍后出版的各种有关著作，如最重要的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对待《春暖》的问题上，都是从研究作品出发，摆脱胡风一派的所谓“批判”文章的影响。毕竟时代不同了，历史大踏步地前进了。

这一段历史情况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不妨认真思考的问题：《春暖》在出版后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不是因为它是“色情文学”，也不是因为它写的是曲折动人的恋爱故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能够吸引广大读者而畅销一时呢？

(三)

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我在此顺便一提，会引起我们对这个文艺界的历史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在四十年代的左翼阵线上，通过胡风主编的颇有影响的刊物《希望》，对《春暖》进行批判，加上发表在别处的“批判”文章，恨不得一棍子将我打死。可是国民党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春暖》，也不满意。台湾老作家陈纪滢原在《大公报》工作多年，是我的老朋友。前三四年，他在台湾出版的刊物《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记姚雪垠》，连载了三期。在谈到《春暖》这部小说时，他先吹嘘我这个人的才华多么出众，然后惋惜我吃亏在跟着共产党走。他说，我在《春暖》中写大别山一带的阶级斗争，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中国社会并没有阶级，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我如果不跟着共产党走，成就会更高。

同一部小说，左翼战线上有人说它是“色情文学”，有人认为它对爱情写得太多，而国民党的朋友说它写的是阶级斗争，岂不有趣？

(四)

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参考消息》上登了一则新闻，报道香港有人写了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女性称为太阳、月亮、星星。小说出版后，有人揭露是抄袭大陆作家的作品。作者不承认是抄袭，随即在报纸上发生了热烈争论。大概由于按照不对“摘帽右派”作宣传的“习惯原则”，所以这一则消息中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春暖》的书名。过了几天，一位在历次运动中一贯立场坚定、积极斗争的同志问我：